

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多维结构及其复合功能

孟和乌力吉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 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是本土牧民所创造和传承的环境技能智慧。具有整体性、技能性、实践性、意识性、民间性和社区性等特点。笔者站在本土生活者主位立场,运用环境社会学、生态人类学相关知识和研究方法,对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的多维结构和复合功能进行深入分析。在现代化与环境建设背景下,我国草原牧区必须采取以现有社区为基础,以文化传承为纽带,以牧民参与管理为方式,以科技借鉴为路径,以传统知识重构为动力的动态复合型应对措施,才能有效规避生态与社会多样性风险。

关键词 蒙古族; 资源环保知识; 多维结构; 复合功能

(中图分类号) Q9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5) 03-0054-08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15.03.008

蒙古族牧民在其漫长的放牧实践中积累出丰富的地方性资源环境保护知识,这些知识的收集、分类、评价和利用,对于现代草原环境保护建设与和谐人地关系建设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既包括地域性资源环境保护经验,也包括民族文化整体意义上的社区维护理念。其特点有整体性、技能性、实践性、意识性、民间性和社区性等。不管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宏观视域看,还是从地域环境具体保护机制角度看,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都能为草原牧区环境政策的多元综合化调整提供新的思路和动力。

一、资源环保知识多维结构

近年来,在国内与资源环境保护知识有关的学术研究逐渐增多,其中“民间环境知识”^{[1](P.176)}“本土生态知识”^[2]“民族生存智慧与生存技能”^{[3](P.218)}“土著族群的传统知

识”^{[4](P.5)}“蒙古族生态智慧”^[5]“草原牧民本土生态知识”^{[6](P.373)}等提法较多,并产生一定的共鸣。回顾以往研究,概念、定义和赋予的时空内涵均有各自特点及优势,笔者从中深受启发。在此研究中试图用“资源环保知识”一词^[7]的原因在于,虽说在社会学与人类学视野中“传统”和“现代”系相当成熟的一对基本概念,然而在现代化大背景下,“现代在消解传统的同时重构了传统”^{[8](P.8)}即传统与现代逐渐在互构和融合,有学者甚至运用“传统型”和“现代型”^{[9](P.64)}概念,以反映社会变迁整体综合特点。“资源环保知识”一词的运用,可以有效超越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应用、资源与环境、边缘与中心以及地域与全球二元理解模式,并有大可发挥的余地。

更为重要的是,“资源环境保护”或“资源环保”的提法,与社会学范畴里的新生态范式“资源、空间、储存地”三维一体环境理念相一

(收稿日期) 2014—12—28

(作者简介) 孟和乌力吉(1972—),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与社会发展、生态与文化变迁研究。

(基金项目) 本论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与蒙古族游牧生态知识的传承保护”(批准号:14YJA850008)阶段性成果之一。

致，从而顺应时代精神，符合社会事实，因为当前是人类社会新的发展和转型时期，即“生态文明时代”；^{[10] (P.18)} 中国正在全面推动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其理论和现实意义非同小可。

在蒙古族本土知识中，资源、生态与环境知识是最为突出的部分。这由蒙古族漫长的游牧经济生产和流动性社会生活所决定的。游牧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与它们卓越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11] (P.3)} 因此，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与自然资源、生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从长时段视角看，蒙古高原生态环境与蒙古族游牧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稳态互动的结构关系，这种关系支撑点之一即是资源环保知识，它成为了牧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技能和实践保障。

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主要包括三个维度的内容，即技能维度的生计知识、社会维度的规范知识和意识维度的观念知识。该知识系统以“资源节约”、“生态持续”和“环境保护”有机结合为中轴，在保持各自相对独立特点的同时，成为了一种多维整体性结构，从而承担和发挥了生态环境复合保护功能。

1. 技能维度

知识是人类在其相关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和环境的成果总和。它既包括事实、信息和描述；也包括教育与实践中获得的技能。所谓的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是以本土牧民为行动主体，植根于蒙古高原及其周围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且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社会延续为朴素目标，从而长期适应、检验与改造的和信任、传承与应用的地方性综合技能体系或多样性资源信息系统。本土牧民在此指，具有有意识放牧者、本土生活者和长时段居住者三重复合身份的地方行动主体。在空间分布上，可涵盖纯牧区、半牧半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其中前两个区域是基础和主体。因此，在范畴上它至少包括游牧生态知识、半游牧生态知识和定居放牧生态知识三大区域的环保知识。在蒙古族环保知识体系里，资源环境是基础要

素；放牧和迁徙是基本实践，它主要来自于个体或群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可以说，资源环保知识是牧民对资源环境和放牧实践的认识总结，因此其多重结构性特点明显。

在蒙古高原各种地理地貌和水热资源环境上形成的放牧迁徙实践是本土牧民基本生计活动，即他们在牧业活动中积累的具体环境技能经验。它主要体现为地理知识、避灾智慧、移动能力和放牧技术及相关工具的总和，是保护和利用草场的应用性机制。它在结构上可分为实践本身和经验总结两类。放牧实践是牧民生产生活活动的成功经验。其主要体现方式是放牧行为。对放牧行为的实地调查是研究者之常用方法。在此基础上，描述、收集和整理，则会形成客位意义上的本土资源环保知识。经验总结则是指生活者对自己放牧行为的理性把握和理论概括。这是主位意义上的本土资源环保知识。

客位资源环保知识是以生态地理知识为主，以居住环境知识为辅的智慧系统。这在游牧转场活动及蒙古包迁徙生活中集中体现。由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牧区社会环境变迁迅速，文化断层现象较普遍，生态环境知识传承不力，因此跟踪调研十分紧迫。主位资源环保知识在民间口传知识、文献资料中大量保留，多以资源利用综合知识为主，其研究和应用意义固然不可忽视。譬如，居住于呼伦贝尔草原腹地，并具有丰富放牧经验的巴尔虎老牧民吉格木德（Jigmed）认为，“放牧经济最为前提条件是草场，即四季牧场。每个季节的选场很重要，比方说，家畜抓基膘要寻找 Bug Ebesu（一种牧草）丰富区域是很重要。抓基膘是一年家畜抓膘的基础。在夏季，放牧于水多地带、山地的凉爽地段，秋季则坚持抓油膘，放牧于羊草、红羊茅、冷蒿、韭菜、沙葱、盐碱多地段。冬天要注重保持肥膘。基于秋季初雪，判断冬季雪情，选定冬营盘。既要利用草场，又要学会保护它，这很重要。民间谚语里有句话说‘不熟草场的人，要跟着野生禽类选址，不懂放牧的人，要在家畜吃草地段就地放牧’。草场上轮牧是游牧经济的主要方式，也是保证牛羊肉无污染和荤菜特性的基础。”^{[12] (P.16—17)} 吉格木德所掌握的牧草名称多达 85 种（包括少量从外地引

进的草种),当地环境地名不少于200个,是巴尔虎草原地区熟练的“乡土向导员”(Nutugčïn)。

在内蒙古西南部,号称“歌舞之海”的鄂尔多斯地区由于沙丘、柴达木、丘陵和湖泊广泛分布,因此传统民歌里相关地貌环境的艺术性表述很丰富。譬如,一首叫《Bayan Hanggai》(巴彦杭盖,富饶的杭盖山之意)的歌曲里有“Hanggai、Tohoi(河湾地带)、šili(高平地或波状高地)、čaidam(湖盆地,盐碱湖泊)、Denji(与湿地相对应的干涸地)、TöhÖm(水洼地或凹地)”^{[13] (P.141)}等一系列重复性地貌名称出现,并通过这种反复强调,充分表达了主人公对自己可爱骏马被盗贼偷走的悲伤心情。这也是集中表述蒙古高原本地地貌知识的民间歌曲资料之一。仅在乌审旗,“čaidam”这种地貌名称及复合地名不少于24个。“更确切地说,蒙古族游牧者关于草地畜牧业的经营方式根据生活经验和生产要求,将规范和决定放在了草地牲畜生态学所允许的合理范围内。这是关于生态环境的分支科学的结论、法律和制度的体现……游牧者将放牧方法、经验和知识传授给子孙后代时运用格言、教谕、传说、成语和口头诗等生动方式,使得他们一听就可牢记这些内容。”^{[14] (P.65-66)}

技能性环保知识多以“hu”、“hü”词尾动名词为主,包括“Belčigehü”、“Harigulhu”、“Hujirlahu”、“Haduhu”、“Huriyahu”、“Ebestilehü”、“Usulahu”、“Emnehü”、“Haičilahu”、“Dellehü”、“HÖnggelehü”等一系列生计概念。由此可见,蒙古族牧民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逐渐形成结构化的生计技能体系,即独特的本土环境智慧。他们历来通过四季转场行动和循环燃料使用,实践了美国社会学家邓拉普(Riley E. Dunlap)和卡顿(W. R. Catton)所提出的“环境的三维竞争性功能”,从而既有效节约了自然资源,又规避了生活环境风险。

2. 社会维度

牧区传统上是游牧社会,它一般是规模较小,流动性较强,更新速度较快的平面性社会组织。浩特—艾勒(Hota—Ail)组织是其重要形

式。浩特—艾勒具有“一定数量的牧户集中在一个营盘,像一个自治的放牧单元,一起移动和劳动”的特点。^{[15] (P.67)}该组织以草根牧民为主体,且环境适应能力和自组织能力均较强。浩特—艾勒在各种时空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特点。

社会一般分两大类,即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其主要存在形式是社区。礼俗社会是相对封闭的社会,其跨区流动和对外交流较少。法理社会则是指现代契约性社会。游牧社会是本土牧民生产、生活和意识领域传统知识的支撑和基础。在草原牧区,游牧社区虽已有现代性要素,但仍属于传统型社区。其社会控制主要依赖于禁忌习俗、习惯法和成文法等行为准则,也包括萨满教的自然信仰、人与环境关系的规制,等等。这些制度文化一直在全面规范和指导牧民行为,包括环境在内的相关社会行为。因此,牧民生产生活行为总带有万物保护色彩。蒙古族牧民“对生长地、山水、森林、野生动物和植物的保护,在生活中与其当时需求及要求相结合,将极端的节约利用方法智慧传承给子孙后代,是多见于狩猎习俗里”。^{[16] (P.55)}

在牧区,资源环保知识与行为规范相交织在一起。在牧民日常环境行为里,社会是行为基础,技能是行为工具,意识是行为导向。环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环境影响行为,在草原地区更多体现为牧民的积极性影响行为。因此蒙古族牧民日常环境行为属于环保类型,是实践、经验、知识和意识的有机结合体。本土生态知识最为重要的是,“它对地方性社会文化脉络的嵌入性的关系。离开社会组织和文化观念的支撑,知识就无法运转为行动,特别是真正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动”。^{[17] (P.68)}

普通牧民作为游牧群体成员,其社会联系多体现在转场过程中的迁徙和安顿过程中的居住两个环节。可以用蒙古语中的“Negühü Baguhu”一对词语来概括。确切说,社会联系更多地集中在居住环节。即“Baguhu”环节更为重要。其中关于生活行为的,以“hu”、“hü”为词尾的动名词有,“Tahihu”、“Jočilahu”、“Barihu”、“Bagulgahu”、“Ailčilahu”、“Irügehü”、

“Amidurahu”、“Harahu”、“Jirgahu”、“Delgerehü”以及表示互动关系的“Hamjilčahu”、“Habsurulčahu”，等等，可谓民间社会规范性行为知识概念。“迁徙之前请精选草场，扎营之前请察看营地”（Negühü in Emüne Belčiger eyen Songgu, Baguhu in Emüne Baguri ben Hara）一句格言所反映的是群体住行活动规范。“秋天要住在锡勒上，冬天要注重羊粪圈（ÖtÖg）；春天要筑好棚圈（Hagagalta），夏天则住在草甸（Jülge）上”。^{[18] (P.21-22)}该祝词形式的资源环保知识，既是四季游牧活动的规律性写照，也是居住社会的规范性机制。它体现了游牧社会与草原自然之间的复合互动关系。牧民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延续着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基本保持一种“艾勒人生命总在一同，邻里人想法总会一致”的规范性观念，即通过社会关系的和谐建构，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睦共存。

3. 意识维度

蒙古族环境保护意识是一种内化的宇宙观念和生活境界，它表现为与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有关的祭祀、仪式等群体行为以及神话、传说、祝词和歌曲等民间文学系列特质的组合。以萨满教为例，“萨满教中既有观念层面上对环境破坏现象的预防措施，又有行为层面上限制环境破坏的宗教禁忌。萨满教的自然崇拜观念中蕴含的生态观念和环境意识比较丰富，形式多样”。^{[19] (P.78)}

个体或群体行为动机是环境行为的支撑点和推动力，而资源环保知识是环境行为所具备的工具性技能。因此，态度和观念与环保知识也有交叉点，或在某种程度上是共生体。在态度层面上，生态与环境意识包括价值、情感、理解、忌讳、崇敬和爱护等内容，是一种生态觉悟和生活素养。在牧区，连干牛粪的收集、堆积和利用环节都需要一套环保知识和生活习俗的支撑。民间谚语中经常反映和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生活意义和社会价值。与此有关的祝赞词、生态歌曲和现代诗词特别丰富。其内涵在于，普通生活活动和环境知识已与价值情感融为一体，体现着生活者主位环境情感和生活理解态度。

在观念上，在草原生态中自然环境比牧民社区更大，几乎包围了整个生产和生活活动空间，

因此牧民在不断地接触、学习和理解大自然的基础上，注重合理规划牧业生产生活。以沙地自然地名知识为例，“毛乌素沙地的蒙语地名和蒙汉复合地名中，自然地名的数量远超出汉语地名中同类地名的数量，因此，蒙语地名和蒙汉复合地名的环境变化指示意义更强”。^{[20] (P.250)}这里说的“自然”是有所“文化化”^{[21] (P.4)}、情感化和观念化的特殊外围环境。即在意识方面，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能够反映当地生活者对自然规律的多层认识，是经验知识和理性思考的结合。从历史变迁角度看，以牧猎为主的传统知识逐渐演变成纯牧、半牧和半农三种经济生产类资源环保知识，分布在广阔的高原、沙区、山地和平原地带。然而在环境态度和日常行为上，这些区域又保留了与中心传统较为一致的共同性，从而维护了民族意义上的资源环保知识的统一性、传承性和共融性。传统社会环境友好努力较多依靠观念意识，而现代社会环境友好努力则更多依赖科学技术，但是复合型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二者的共同作用。

二、资源环保知识复合功能

内蒙古广泛分布着平均海拔 1000 米的高原草地，同时也分布着比例较大的山地、沙区和湿地，并形成与草地环境相适应的本土知识和牧农结合经验。这些复合性资源环保知识是蒙古族牧民反复检验的地方性智慧，对它的应用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草原牧区可持续性社会发展。在现代化、城市化浪潮中，其现实意义非同一般。

（一）资源环保知识普通功能

在草地生态基本特点和牧民本土经验上形成的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具有生态平衡、社区维护和文化遗产三大功能。该三大功能要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宏观层面上对其整个结构承担了支撑，维护了系统的安全。同时在微观层面上，相辅相成地构建了环保知识的整体活用特性。三者并行不悖，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广泛发挥作用，为草原生态系统总体平衡做出贡献。

1. 生态平衡功能

内蒙古高原牧区自然灾害较频繁，生态环境

脆弱，水资源短缺，蒙古族主要生产和生计是以适度环境行为和定期游牧活动为基础的。这种行为活动本质上是本土生境的创造过程，并在此过程中要遵守地貌环境维护和植被资源利用有机结合的准则。因此，游牧生计活动有利于草原地区脆弱环境的保护。在国外，英国的部分介入生态保护区的做法、日本的全面介入生态保护区的做法，即人与自然的完全重叠和良性互动均有此特点。在内蒙古牧区，作为游牧生计技能工具的资源环保知识的应用当然有利于生态平衡，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

譬如，牧民在解决燃料问题的同时，把家畜粪便也处理掉，这样既能节省空间，又能节约资源，灰烬也能成为土壤腐殖层的必要养分。由于使用了干牛粪、干羊粪（Horgol）和羊粪层（Hörjeng），因此客观上保护了有限的森林资源和植被覆盖。资源（Resources）原来指生命或活泉。对于草地环境里生活的牧民而言，生态资源既是一种景观资源，也是复合稀缺资源，更是一种认知来源，其利用要遵守循环再生规律和系统平衡的认知原则，即天、地、草、畜、人五维一体的环境伦理规范。

2. 社区维护功能

游牧和半定居社区是牧区社会主要存在形态，是相对分散且功能互补性较强的社会组织。在草原牧区，牧民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活动主要是与自然环境进行的接触和互动，人与人的关系更多以人与自然的联系体现了出来。“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重叠在一起的，即生活者与自然环境是融为一体的。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恰恰是社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条件和桥梁。社区成员的诸多集体活动均与资源环保知识的创造、传承与应用有关。社区发展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资源环保知识的传承、应用与发扬；而资源环保知识的应用也离不开社区所提供的相关要素的支撑。

由此可以说，游牧社区是资源环保知识的社会基础，资源环保知识亦对游牧社区起到维护作用。即在社区生计、社区凝聚力及社区运行方面发挥系统性维护功能。“承认自然的权利，就要比从前更加敬重地对待自然，因此塑造出更加适

度的对自然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塑造为权利关系并非保持适度的灵丹妙药，但却是给与自然在世界中更多分量的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尝试”。^{[22] (P.315)}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牧民文化意识里大自然具有自己存在和循环的“权利”，并呈现出与当前全球环境伦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主旋律的一致性。同样，在本土文化里环境是多层主客互动整体，包括敖包祭祀仪式、毡房涂抹仪式等均有此特点，因此相当重视全民参与性、行为一致性和社区协同性。这种社区参与行为在体现着朴素环保精神，它自然排斥了影响行为和破坏行为。“此外，社区中传统的知识也可以弥补现代科学知识的不足和简单化”。^{[23] (P.203)} 在现代化浪潮中，地方性知识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游牧地域的相对“纯社区”特征。“在可持续发展中，人们已意识到当地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观点，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管理环境的方式，只有在环境计划中反映当地的信念、价值和意识形态时，社区才给予支持”。^{[24] (P.57)} 由此可知，资源环保知识的激活应用是社区稳态延续的支撑因素。

3. 文化传承功能

按照日本知识管理学者野中郁次郎（のなかいくじろう）的观点，知识是被确认的信念，可以通过知识持有者和接收者的信念模式和约束来创造和传递。此过程本身也是文化系统传递过程。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是多维复合体，它承载着许多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对它的应用自然有利于游牧文化的传递和传承。“从生态哲学视界审视，游牧经济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深厚的生态意蕴，游牧民族的生存、生活和生产具有明显的简约循环化特点和突显的绿色生态化特征”。^{[5] (P.185)} 从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角度看，牧草、家畜和牧民看似是具有因果逻辑关系，但其实是资源循环再生关系，或者一种全方位复合互动关系。家畜吃草，其粪便也可滋养牧草。家畜粪便的一部分由自然界和生物来分解，另一部分则是由牧民的“主动干预”来解决。当然，这种“干预”依赖于资源环保知识的运用，也与信仰、祭祀和审美习俗联系在一起。这是牧区传统燃料开发利用的“一石多鸟”效应，是以生

活活用来传承游牧文化的有效方式。与现代农村牧区燃煤燃气的推广相比,是投入更少、综合效益更大的就地资源利用模式。“古代蒙古人在长期的牧业生产活动中逐步演化,并得到多数人自觉自愿遵守的规则系统”。^{[25] (P.55)} 该系统的维持有利于资源环保知识的发扬与创新。实际上,“文化不仅是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为了(人类)在地球上某特定场所里幸存下去而必备的工具性调节器”。^{[26] (P.17)} 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是游牧文化生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地域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体。它作为公民环境教育的生动教材之一,既能促进公众环保素养的提高,又为草原地区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性调节器和本土机制。

2. 资源环保知识功能扩充

伴随我国经济较高增速的发展和以工矿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资源开发的加速,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内在原因可归结为,生活在地域各项建设中主体性的弱化和传统知识的解组。从资源节约和资源利用角度看,牧民传统知识具有重要的生态维护价值。蒙古族游牧文明是生态型文明,其核心伦理是“把伦理道德的范围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扩展到人与人的关系,而西方发达国家却是从人与人扩展到人与自然。这与东西方人最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同而引申出来的”。即其生态伦理是“以敬自然神为信仰基础的”。^{[27] (P.13)} 生态知识贯穿了日常生产、生活和价值观念各环节。因此,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既有现代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理论价值,又有地域环境问题解决的应用价值。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28] 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继续突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并强调

“健全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29] 这从长远和前瞻原则指明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明确了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发展方向。2013年3月通过的内蒙古“8337”发展思路八个发展定位里强调“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三个更加注重里包括了“更加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内容。这又对内蒙古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打好了理论和方向基础。

与此背景相结合可以认为,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所强调的是一种主动适应(Johiçagulhu)与能动放牧(Harigulhu)和积极生活(Ondurugulhu)相结合的可持续环境理念,在社会巨变中同样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重构能力,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资源管理理念。它在环境规划方面创建了一种“防患于未然”或“以防为主”的环境保护“预警”机制,与国家资源与环境保护总政策里的“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理念是相通的,与以目的理性行为为支撑的现代财富无序增长理念则是相冲突的。“全世界的草原,轻度到中度退化的几乎占一半,而严重退化的有5%。和海洋渔场的退化没有不同,草原的过度压力,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影响”。^{[30] (P.65)} 根据《全国草地生态破坏经济损失核算研究2006》结果,“2006年度中国草地生态系统生态破坏损失价值为1446.8亿元,占2006年中国GDP(21.087万亿元)的0.69%。”更应关注的是,“西部地区草地生态破坏损失远大于东中部地区。达1259.3亿元,占87.1%。”其中“内蒙古损失250.3亿元,占全国总损失的17.3%”。^{[31] (P.475)} 这些包括水土保持损失、气候调节损失、水资源涵养损失,等等。由此可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草原环境保护治理的困境和紧迫性,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环境开发中注重当地生活者经验、知识和智慧的必要性。

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是集实践性、技能性、民族性、地域性、社区性和价值观念于一体的复合型智慧体系。对于我们审视沙化、沙尘暴、草地退化和工矿污染问题,反思以往单一且脱离社区的政策管理模式而言,是必须继

承的地方性成功经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同性知识和通用性技术的推广“不仅生态建设所需的成本高,收效不大,而且可能诱发新的生态问题”^{[32](P.91)}情况相比,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的应用却是成本低,收效大,不可能诱发各种资源短缺和破坏问题,因此应成为解决牧区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现有绿色行动。“传统土地对于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本土社群要面临和土地的分离”^{[33](P.158)}因此,草场保护不能脱离本土社区的维护、参与和支持,也要注重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互补及

融通。“无论乡土知识、民间智慧,还是都市知识、科技智慧,都不能超越人的生理局限,不能超越世界多变与人类认知潜力无限这样一些基本矛盾。正是这样一些矛盾面前,城乡、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被化解,达成一致”^{[34](P.256—257)}笔者由此认为,在现代化与环境建设背景下,我国草原牧区必须采取以现有社区为基础,以文化传承为纽带,以牧民参与管理为方式,以科技借鉴为路径,以传统知识重构为动力的动态复合型应对措施,从而有效规避生态与社会多样性风险。

(参考文献)

- (1) 马国庆. 走进他者的世界 [M]. 北京: 学院出版社, 2001.
- (2) 杨庭硕, 田红. 本土生态知识引论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 (3) 罗康隆. 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4]
- (4) 尹绍亭, (日) 秋道智弥. 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5) 乌峰, 包庆德. 蒙古族生态智慧论: 内蒙古草原生态恢复与重建研究 [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9.
- (6) 柴玲, 包智明. 中国环境社会学 (第一辑)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7) 孟和乌力吉. 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的传承与应用—兼论内蒙古牧区环境与发展关系 [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4, (3).
- (8) (英) 安东尼·吉登斯(田佐中, 刘江涛译). 为社会学辩护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9) 郑杭生. 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二 [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3, (5)
- (10) 余谋昌. 生态文明论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 (11) 王明珂著. 游牧者的抉择 [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12) 宫格尔扎布. 牧人的荣耀 (蒙古文版) [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3.
- (13)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内蒙古分卷编委会. 蒙古族民歌集成 (五) (蒙古文版) [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5.
- (14) (蒙古) 达·巴扎尔古尔. 草原畜牧业地理 (蒙古文版),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 (15) 丹尼尔·罗森伯格. 游牧社会的转型与现代性 (蒙古卷)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16) (蒙古) 乐·铁木真. 蒙古族自然保护传统技法辑要 (蒙古文版)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
- (17) 韩念勇. 草原的逻辑 (第二辑)—顺应与适度: 游牧文明的未来价值 [C]. 北京: 北京科学知识出版社, 2011.
- (18) (蒙古) III·嘎丹巴 Ⅱ·策仁苏德那木. 蒙古民间文学精华集 (蒙古文版)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
- (19) 色音. 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环保意识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99, (2).
- (20) 何彤慧, 王乃昂. 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21) (日) 鳥越皓之, 带谷博明. よくわかる環境社会学 [M]. 东京: ミネルブア書房, 2009.
- (22) (瑞士) 克里斯托弗·司徒博(邓安庆译). 环境与发展—一种社会伦理学的考量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23) 王晓毅. 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 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24) 麻国庆. 草原生态与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1, (1).
- (25) 敖仁其, 额尔敦乌日图等. 牧区制度与政策研究: 以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变迁为主线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9.

- (26) (美) パトリシア・K. タウンゼンド (Patricia K. Townsend). 環境人類学を学ぶ人のために [M]. 东京: 世界思想社, 2004.
- (27) 暴庆五. 蒙古族生态经济研究 [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
- (28) www. xinhuanet. com , 2012. 11. 8.
- (29) www. people. com. cn , 2013. 12. 14.
- (30) (美) 莱斯特·R·布朗(林自新等译). 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2.
- (31) 王金南, 邹首民, 田仁生, 张惠远. 中国环境政策 (第五卷) [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
- (32) 杨庭硕等. 生态人类学导论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 (33) (英) 简·汉考克(李隼译). 环境人权: 权力、伦理与法律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 (34) 纳日碧力戈.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and Complex Functions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nowledge of Mongolians

Menghewuliji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 Hohhot , Inner Mongolia 010070)

[Abstract]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nowledge of Mongolians reflects environmental skills and wisdom created and inherited by local herdsmen with characteristics in skill , practice , consciousness , folklore and community. Taking the position of a native , the writ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and complex functions of the knowledge by using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 dynamic and complex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in pastoral areas to avoid risks caused by ecological and social diversity by taking the existing communities as the basis ,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 encouraging particip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erdsmen , develo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construct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Key words] Mongolians;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nowledge;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complex functions

(责任编辑 苏日娜)